

消费问题探究

杜一程礼泽

消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问题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实际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所以，正确地恰当地处理好消费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消费是指“原来意义上的消费”^①，即生活消费，它涉及相当广的范围，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需求、消费效果、消费行为、消费模式等等。当前，在我国消费问题是个相当突出、相当尖锐、相当敏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集中反映在消费领域中。近几年来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快、消费欲望大、消费标准高，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以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1979—1986年的环比指数为例，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工业产值增长率的有1年，接近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有3年，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有4年，接近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有2年^②。1988年总供给比上年增长19.3%，而总需求比上年增长22.1%^③，1988年居民收入占GNP的比重由1984年的59.9%，上升到62.2%^④。由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货源与购买力之间的差

距逐年扩大，如1985年缺口为500亿元，1986年为744亿元^⑤，1987年为740多亿元^⑥，1988年为800亿元^⑦。1988年的供需差率由上年的13.6%，扩大到16.2%^⑧。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货币流通量的剧增，1983—1988年中，由530亿元剧增到2134亿元，五年中增加了3倍^⑨，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使消费领域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其中居民因物价上涨多支出的金额，1988年达1250多亿^⑩。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我国消费基金的膨胀，在职工收入方面的表现，并不等于是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过快，而是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增长较快。开放搞活后，城镇居民收入呈多元化趋向，它反映在不同人员的不同收入来源上，以及同一人员拥有或明或暗的多条收入渠道上。1988年与1981年相比，按当年价格计算，职工人均月收入增长115.4%，平均每年增长11.6%，其中工资外收入增长271.1%，平均每年增长20.6%，而工资收入只增长92.8%，平均每年增长9.8%。职工实际工资总额，除1981、1984、1986年增长较快外，“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7.9%，而同期国民收入每年增长9.9%；最近这两年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率都较低，1987年仅增长0.83%，1988年下降0.8%，1989年

上半年则下降 5.7%。所以，我国职工工资增长除年度间比例不甚合理外，从总体看不存在膨胀失控的问题。详见信长星等的《消费需求膨胀与工资改革》文章，《经济研究》1989年第11期)。第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但城乡居民的积蓄额却很大，它构成一个潜伏着的巨大购买力的压力。以我国198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14015亿元和国民收入11770亿元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分别约为340美元和290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人均GNP在1000美元以下者为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国又是大大落后于这个标准的。我国的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处于较低状况，但都在逐年增长中，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水平过渡。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现金收入1949年不到100元，1952年增加到155.5元(扣除物价因素尚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1978年收入达378.2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增长55.5%，1988年达1269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提高一倍^⑩；农村人均纯收入，1988年为54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11.8%^⑪。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1952年为76元，1965年为125元，1976年为161元^⑫，1978年为175元，1986年为450元^⑬，1987年为504元^⑭，1988年为639元，1988年为1952年的369.8%^⑮。总之，我国人民的生活并不富裕，消费水平也较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我们高十几倍至几十倍^⑯，然而，我国11亿人口的生活质量却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营养方面，1985年我国每人每天食物热值为2620大卡，高于发展中国家2460大卡的平均水平，接近2694大卡

的世界平均水平；穿的方面，1986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为10.6公斤，高于发展中国家3.8公斤的水平；用的方面，1988年我国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3.2台，洗衣机6.2台，电冰箱1.8台，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住的方面，1988年城镇居民人均8.79平方米，农民人均16.6平方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医疗保健方面，1988年我国拥有医生162万人，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为676人，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个医生服务4940人的水平；人口预期寿命，1987年我国为69岁，高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64岁；婴儿死亡率，1987年我国为32‰，低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56‰的水平^⑰)，我国城乡居民的私人积蓄却相当可观，并在继续增长中。1989年9月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为4806亿元^⑱(4806亿的数字中，肯定不纯，其中有公款私存的水分——笔者注^⑲)，全国个人认购的国库券累计有236亿元，个人认购的国家建设债券、重点建设债券、银行金融债券合计有88亿元，还有居民手持现金约1700亿元^⑳，以上几项合计约6800亿元。对于这种潜在的消费力，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调节来缓解。第三，市场疲软是近期消费中出现的一种现象。经过治理整顿和政策措施，1989年的基本建设压缩了10%^㉑，加上银行实行保值储蓄，消费倾向减弱，物价涨势趋缓，去年一度出现的市场抢购风得到遏止，随之而来的出现了市场疲软景象。据统计，目前全国商业库存总额已逾300亿元，加上工业企业待销售的产成品库存，全国商品库存量已达1500亿元，比上年增长30%以上^㉒，其中超储部分500亿左右^㉓。因此，如何活跃市场，引导消

费，也是当前消费领域中的一个尖锐问题。第四，分配不公引起的消费不公，以及畸形消费状况的存在，也是消费领域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以上海为例，上海收入最高的有十种人，他们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业主；“走穴”演员和组团演出的“穴头”；各类经纪人；从事国库券买卖的贩子；合资企业中方负责人；乡镇企业承包者；新办公司负责人；在联营中得利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涉外导游；出租汽车司机。在这十种人中，年收入最高的达40多万元，最少的也在6千元左右^⑯。如此悬殊的收入差别，必然带来消费上的悬殊差异。^⑰不少地区畸形消费在增长，如封建迷信的消费活动，高价造坟消费，还有豪华型的喜庆消费，以及负债消费等，它已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第五，公款消费失控，仍是个值得警惕的问题。近年来社会集团购买力失控，1982—1987年社会集团购买消费品种平均每年递增19.7%，远远超过同期轻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⑱。1988年比上年增长20.3%^⑲。据统计，社会集团消费1980年以前不超过200亿元，1981—1983年不超过300亿元，1984年超过了300亿元，1985—1986年超过了400亿元，1987年为553亿元，1988年又增长到665亿元，以上还仅是纳入正规渠道的数字，如加上“漏网”部分，社会集团消费的资金超过1000亿元^⑳。我们仅仅归纳了五个主要问题。这里有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认识问题需要提高，也有实际和政策问题需要调整。由于消费问题涉及相当广、深的领域，本文仅就消费理论一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适度消费、消费结构和科学指导消费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消费理论一般

生产决定消费，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它表现在：第一，生产为消费创造对象。任何消费只能在生产的前提下才会有闪光点，生产部门如果不生产出消费资料，消费就无从谈起。有了粮食，才有食物的消费；有了电子工业的生产，才有电子产品的消费。第二，生产决定消费方式。“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㉑这说明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消费对象不同，消费方式也就不同。第三，生产还为消费品提供了消费的主体。有了某种消费品的生产，才会引起消费者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如收音机、单卡收录机、带电脑的双卡收录机等系列产品的出现，总会在某种程度上诱发消费的倾向性转移，崛起新的消费者群体。

消费也推动着生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主要表现在：第一，消费创造出发展生产的动力。人类要生存、要享受、要发展，就要通过生产活动谋取物质资料，但是生产的动力不是来自生产本身，而是来自消费。生产只是在客体上提供了消费的对象，而对这些物质对象的需要，是人在观念上首先提出来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所以消费是生产的出发点，它不仅推动着生产的发展，还推动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与繁荣。第二，消费是物质产品的最后完成，是生产的归宿。物质产品从生产过程分离出来，并不是其最后完成，只有通过社会检验，对社会有用，被消费了才成其为产品，才有实际意

义，所以消费是生产的归宿。第三，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从生产的连续性上看，生产活动不仅需要生产资料，还需要劳动者，而劳动者要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就必须要消费，所以人的消费并不独立于生产之外，而表现为生产的要素。第四，消费制约着流通的规模和速度。流通作为联接生产与消费的媒介，它的规模与增长速度必然受到消费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制约。如果消费资料的流通规模和速度与消费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就可能出现流通领域中的消费品大量积压造成浪费，或消费品供不应求，引起市场紧张、物价上涨，这些都会扰乱再生产的正常秩序。第五，消费为市场提供信息。消费信息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而广大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状况，又是市场信息的最终和可靠的来源。

总之，我们探究消费问题，起码要对消费理论一般有所认识。

二、坚持适度消费

我国现阶段的消费，必须坚持适度消费。

所谓适度消费，是指适应于国情国力、生产力水平和自然资源的消费状态，又可称之为合理消费或科学消费。消费是否适度，主要是考察消费水平是否适度。制约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有：（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通常情况是，生产水平高，社会总消费水平就高些，反之则低些。（2）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收入总额一定的条件下，积累率的高与低决定着消费基金总额的多与少，从而直接影响消费水平。（3）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在国民收入和消费基金一定的

条件下，人口总量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所以，衡量消费适度的客观标准，就是消费主体的经济力量与消费机制运行之间的对比关系。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来说比较低，所以采取适度消费模式，使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那种消费“国际示范”作用中的消极影响，必须坚决抵制。据计算，我国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约1000亿元，而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人左右，还要安排400万人就业，新增国民收入的一半用于这两项，余下的还要安排追加投资和改善生活，所以消费必须适度⑩。

我国现阶段的适度消费模式，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消费需要的满足，是多层次和逐步实现的。多层次包括人们对物质消费资料需要的层次和社会成员富裕程度上的层次。人们对物质消费资料需要的层次，是指基本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在我国现阶段满足需要，只能是首先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即吃、穿、住、用、行、保健等，进而才能满足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即人们尽可能地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使生活过得更愉快和舒适，并适应科学技术进步，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日益获得全面的发展和运用。至于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出现的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层次上的差别，也就会带来在满足需要的层次上的差别，其中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个人、企业和地区，他们的消费需要将首先得到比较充裕的满足。第二，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选择性，还受到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制约。我国现阶段经济总的状况是短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大大超过总

供给，商品经济和市场还很不发达，整个社会提供消费品的商品率还较低，因此人们对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选择性还难以实现，消费品买方市场的形成还有待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还将处在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过程之中。第三，消费水平的增长，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消费水平的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却是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它要取决于资源、技术、劳动力素质、管理经验、经营水平和利益调节机制等客观条件的相互制约，这都不是一蹴而就，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更何况我们受着自身特定条件的制约，难度会更大，时间会更长。所以，消费水平的增长只能是渐进的、逐步上升的过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进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我国适度消费的典型描述；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

在我国决不能仿效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模式，道理很简单，高消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行不通。首先，高消费会加剧我国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影响比例协调。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总供给满足不了总需求，如果提高消费，膨胀消费基金，只能萎缩生产，使本来已经超载的生产力水平更加难以承受，就会加剧消费品供求不平衡，助长物价上涨，导致经济生活混乱，形成恶性循环。其次，高消费会降低国家积累，影响长远利益。如果消费水平提高过快，消费基金增长过多，势必影响积累基金的增长，实现四化所需的资金来源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第三，高消费会导致消费基金膨胀，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现在国

家的财政补贴已经相当惊人，1988年全国的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总额达762.78亿元，1989年预计将达931.17亿元，分别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9.5%、32.6%，是个沉重的包袱。如果再增加高消费的基金，势必增加财政压力，使财政陷入危机之中。第四，高消费会增加生产成本，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最终还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第五，高消费会滋长不健康的消费行为，影响社会风气。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畸形消费、负债消费、超前消费、乃至“黄色”消费，无不与西方高消费的影响有关，有的已经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增长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所消费的各种类型的消费资料在总消费资料中的比例关系。宏观消费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微观消费结构是指单个消费者或单个家庭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一定社会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整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从消费的材料或对象上来反映人们消费关系的社会性质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消费结构，通过消费对象的质和量的差别，反映出阶级对立的消费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费结构，也通过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从质的规定和量的比例上反映人们消费关系上的既平等又有差别的性质。我国现阶段，人们在消费结构上也存在着差别，但它不反映阶级对立，而主要是反映劳动贡献上的差别。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运动和国民收入的运动，都要采取实物形式

和价值形式，因此消费结构也必然表现为这两种形式。实物形式的消费结构，是指人们消费了哪些消费资料（包括劳务）及其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的消费结构，是以货币表示的人们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实物形式的消费结构决定价值形式的消费结构；价值形式的消费结构反映实物形式的消费结构。在我国研究价值形式的消费结构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计量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与劳务的消费比重和支出结构，从而有利于组织生产和流通，有利于实行国民经济的实物与价值形式之间的平衡。

研究消费结构又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分类，如：（1）按满足消费需要者的不同层次，可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前者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后者是更高层次的生活资料。（2）按消费品的功能，可把消费资料分为吃、穿、住、用、行等方面，如食品类、衣着类、日用品类、文娱用品类、书报杂志类、药品类、劳务类等。这种划分比较具体，便于统计和计算，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主要采用这种分类方法。（3）按消费资料的物质形态，可把消费资料分为实物消费和劳务消费。实物消费是物质产品或有形产品的消费；劳务消费一般是通过服务提供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它是一种以运动形式提供的服务活动的消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务消费在人们生活消费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教育、文艺、体育、医疗、卫生、商业等的劳务消费，能够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实物消费与劳务消费的划分，不仅有利于全面分析人们的消费状况，也有利于根据它们的发展变化状况，协调物质生产部门和劳务部门的

关系。（4）按消费需要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个人消费一般是指吃穿住用等实际支出的消费行为；集体消费主要用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等项目。在我国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安排好个人消费基金与集体消费基金之间的比例，是研究消费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上这些分类，都有其科学和合理的地方，它们也都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深化研究消费结构，提供了依据和方法。

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及其变动呈现如下的趋势：生存资料在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将逐步缩小，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比重将逐步增大；吃的消费所占的比重将逐步下降，穿、用、住的消费所占的比重将逐步上升；低档消费资料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减少，中档、高档消费资料所占的比重将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各种劳务消费所占的比重也将逐步扩大。这个总趋势，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相吻合的。当然，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需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而且我们又受着人口、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消费结构的改善不能过高过快。

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从战略上来考虑，主要应该突出如下几点：

第一，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化，必须符合我国的社会性质。建立中国式的合理的消费结构，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消费观为指导。资产阶级的消费结构虽也有某些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映资本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我们的消费结构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体现科学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必须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消费习惯，民族传统等实际情况出发。我国食物结构的改善，只能建立在食物生产所允许的范围内，它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同时也受消费习惯和民族传统的影响。在食物结构方面，应该逐步提高肉、蛋、禽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比重，但不可能也不应该向西方国家那样以动物性食品为主、以肉食为主，而应使动物性食品与植物性食品并重，以植物性食品为主。在衣着方面，我们也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我国的丝、麻、毛等织物和皮革制品，只能适当增加，而不可能成为衣服的主要内容，还是要提倡多穿棉织品和化纤混纺的织物。我国的家用电器的消费也只能适度增加，象空调机、冷热机等限于能源不足、电力供应紧张，在一个长时期里应当控制其生产、进口和消费。人们的居住条件需要不断改善，但住房面积和建筑标准也不宜过高。那种盲目追求豪华型、超豪华型的消费，是与国力和人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不相称的，应该受到较大的限制。

第三，必须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出发。我国人口结构中，大多数人还是农民，广大农村是消费市场的主体，农村消费结构又有许多不同于城市的特点，它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甚大。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研究农村的消费问题，诸如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将会对农民的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农民购买力投向的趋势；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来适应农村消费结构的变化等问题。

第四，必须处理好人们的商品需求和劳务需求的关系。商品需求和劳务需求是消费需求的两种形式，二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替代。在一般情况下，影响居民对

二者转向的重要因素，就是商品价格和劳务收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我国长期以来人们的劳务需求受到严重压挤，造成商品需求和劳务需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劳务事业，扩大居民的劳务费用的支出，相对减少居民的商品需求，从而缓和商品供需的矛盾。此外，还可以通过发展劳务事业，来减轻亿万人民的繁重家务劳动，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并使广大职工赢得闲暇时间。

第五，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发展乡村文化消费。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包括：城市道路、通讯、供水、供电、供气、公厕，以及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影剧院、游乐场、广播电视设施等，加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需求。在农村，还必须引导农民大力进行智力投资，发展文化教育，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并加强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交流，使我国广大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得到应有的发展。

四、正确引导和调节消费

消费引导是指政府、组织（企业）、乃至个人，根据某种需要运用一定的手段或方法使消费者改变原有消费意向，按照引导者的期望进行消费的一种活动。对消费进行引导和调节，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它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的需要。因为通过合理的科学的消费，可以促使人们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劳动者。其次，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

因为合理的科学的消费，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改变落后的传统习惯，抵御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袭击，使劳动者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的生活过得舒适、美好。再次，它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需要。因为合理的科学的消费，可以使人们的消费大体上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缓和消费品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我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未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特别是1984年以来受到“高消费”热的影响，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1）消费基金膨胀，消费水平增长过快，出现了“消费过度”的问题。突出问题是消费基金的结构性膨胀，表现在奖金和各种福利补贴相对于工资来说增长过快，致使工资收入在消费基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奖金和各种福利补贴所占的比重急剧上升；还表现在社会公共消费部分在消费基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增长过快。（2）消费需求增长的层次序列被扭曲，导致消费结构失衡。当前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热点”过于集中在高档耐用消费品上，这在较低和中档层次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很好地满足的条件下，难以形成合理的消费需求层次，它不利于经济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也不利于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发展。就我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同日本大致相同的时期比较，消费支出中“用”的比重明显偏高，耐用品、高档消费品的普及率要大

得多。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用”的支出占18%，电风扇、洗衣机、收录机、电视机的普及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达到90%、60%、52%、93%，而1960年的日本，“用”的支出比重仅占8%，电风扇、洗衣机、收录机、电视机的普及率分别为37%、34%、23%、30%。（3）消费者行为方式变态。消费者心理受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方式的“示范效应”的冲击过大，模仿性消费方式和炫耀性消费方式，如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等，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既然当前消费状况中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的引导和调节。

第一，建立消费基金的宏观调控系统。重点是加强对消费基金的宏观管理和综合平衡。消费基金的增长必须严格按照生产增长状况确定，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指标体系，包括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收入与消费基金增长的比例、职工年均工资和奖金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例、财政收入与集团消费增长的比例、工资与物价增长的比例等等，切实地使消费基金的增长建立在生产增长、经营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并自动协调消费基金内部的各个利益主体的分配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对税后利润的分配和使用的自主权有所扩大，但责、权、利未能很好地结合，企业往往把大部分留利用在职工奖金、福利支出方面，这种分配机制导致了居民购买力和社会集团公款消费的同步增长，因此必须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二，对现存的未实现的消费基金采取积极引导措施。现在我国城乡居民的私人积蓄和机关团体的结余货币购买力已经相当可观，对待这种潜在的购买力压力，

唯一的办法就是引导其推迟消费或改变其使用方向，手段主要是通过银行吸收储蓄，导向投资和消费分流。为此，要开展和做好如下方面的工作：（1）利息率具有保值性。我国现行开展的保值储蓄效果明显，起到了稳定储蓄、稳定金融的作用。（2）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可以利用国库券、公债、金融债券、储蓄债券、有奖储蓄等，充分吸收民间资金。（3）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城市或农村信用社吸收股金，以及公司、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等来吸收游资，从而使闲置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金。当然开展这项工作要特别慎重，要有组织的进行。此外，住宅商品化也是吸收资金的有效途径，据测算现有公房只要出售一半，便可回笼货币2000多亿元。

一年来，经过治理整顿和投资导向，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控制，物价上涨势头趋缓，货币回笼情况好转，人们对涨价的预期逐渐平复，又从几次抢购中吸取教训，从盲目地抢购变为理智地选购，并产生观望心理，持币待购，从而出现了市场疲软现象。这个问题是每个消费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首先，从我国经济的总体来看，主要问题不是商品过剩，而是短缺。市场疲软是一种阶段性的效应，是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控制通货膨胀，继续执行好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如保值储蓄等），严格防止“膨胀——调整——再膨胀——再调整”的局面出现。可以想象，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稍稍出现一点不慎，比如我们取消保值储蓄，就会引起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的混乱，通货膨胀抬头、抢购风潮再度掀起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决不能因出现市场疲软而思想麻痹，放松警觉。其次，

要把当前的市场疲软作为转机，调整好产品结构，促进企业创新，尤其是做好产品售后的服务工作，为在我国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换打下切实的基础。再次，严格控制国内可以生产并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消费品进口，也是缓解当前市场疲软的有效措施。我国现在大量进口化妆品、香皂、饮料、味精、手表、眼镜、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不仅花去大量外汇（如1988年进口化妆品用去外汇2700万美元，进口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花去外汇8500万美元，进口饮料光是今年1—5月用汇3700多万美元^②），而且严重地冲击了国内工业和市场（如味精产量我国是世界第一位，自给有余，有些品种还获世界博览会金奖，但进口至今开着绿灯；香皂，我国年需要量为12万吨左右，国内生产能力已达12.15万吨，但英、美、法、日、澳等国的香皂还大量涌入）。这种一方得利，全局失利的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有关主管部门要下决心煞一煞此风。

第三，要特别重视提高人民的消费效果。同样的消费资料、消费量和消费时间，其消费效果却可以大不一样。比如，同是故事片和电视剧，思想艺术水平较高，欣赏水平也较高，收到的社会效果也就较好；反之，就差些。科学的消费引导应该针对我们的有限资源，努力提高消费者的思想觉悟、审美观点和身体素质，为此应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提高消费品（包括劳务）的质量，丰富消费品的品种和规格，改进消费工具的性能等，使广大社会成员以尽可能少的消费支出，获得更好的消费效果。

第四，保证基本消费，抑制奢侈性消费。对于不同层次的消费水平，国家可以

通过对不同消费资料采取不同的政策，既可满足其需要，又可为国家回收资金。比如国家对基本消费资料仍可采取财政补贴，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减少财政补贴；对奢侈性消费，可以价格放开，并课以重税，以抑制其消费膨胀。

第五，妥善处理消费不公的导源——分配不公。

消费不公是由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是难以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或可以缓和的。比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的收入，一般比国家职工高几倍、十几倍至几十倍，但这毕竟是与职工的按劳分配具有不同类型的收入分配，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他们的收入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并遵法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他们的收入多一点，消费水平高一点，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们除了合理的科学的引导其消费外，应该鼓励他们再投资，为此我们建议

国家实行投资减税的政策。分配不公中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演员“走穴”和“穴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并对其过高的收入除国家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外，有关单位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国库券买卖的贩子，属于非法经营，应该取缔；对于企业承包人的过高收入，应该在完善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并作出相应的规定，现在有的地方在试行承包人的收入不超过企业平均工资的3倍，这种做法是否妥贴可以研究，总之过去那种收入悬殊的差别应该得到合理解决。

最后，我们还建议国家对于我国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政策、消费发展规模和速度等，作出近期、中期和远期的规划，以促进我国消费问题的研究，并使之进入一个高层次的研究轨道。

注释：

-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
- ②《人民日报》1987年3月28日。
- ③④《人民日报》1989年1月30日。
- ⑤《经济学周报》1988年12月4日。
- ⑥《光明日报》1988年6月22日。
- ⑦⑧《人民日报》1989年1月30日。
- ⑨《人民日报》1989年9月1日。
- ⑩《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12日。
- ⑪《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
- ⑫《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5日。
- ⑬《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9月7日。
- ⑭《人民日报》1987年3月29日。
- ⑮《经济学周报》1988年5月8日。
- ⑯《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10月3日。
- ⑰参见《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9月7日。
- ⑱《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5日，10月16日；《文萃周报》1989年9月28日。
- ⑲《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9日。
- ⑳参见《金融时报》1989年10月14日。
- ㉑《经济参考》1989年10月9日。
- ㉒《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7日。
- ㉓《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9日。
- ㉔《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8日。
- ㉕《生活周报》1989年8月6日。
- ㉖《人民日报》1988年9月6日。
- ㉗《人民日报》1989年1月30日。
- ㉘《经济日报》1989年5月23日。
- 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
- ㉚《经济参考》1989年11月14日。
- ㉛《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7月24日。
- ㉜《人民日报》1989年3月13日。
- ㉝《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9日。